

## ■ 社科理论

## 明代榆林地区卫所移民与地域文化变迁

乔 壮

(兰州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730020)

**摘要:**榆林地区长期作为明蒙战争冲突的军事前沿,为抵御蒙古对这一地区的侵扰,明朝在榆林地区设置了大量军事卫所,并向卫所进行了多次军事性的移民实边活动。卫所移民通过主导营建卫城、屯垦生产、兴办教育等社会治理措施,实现了其在陕北的地域社会构建,形成了以卫所为中心的独具特色的地理单元,在教育文化、风俗习尚、民间信仰等诸多方面不同于内地其他地区,卫所移民也成为明清以来榆林地区地域文化变迁的重要参与者和引领者。

**关键词:**榆林;卫所;移民;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 K248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198(2022)01-0055-05

榆林古称“上郡”、“榆中”等,始于春秋战国,兴于明清,是明代北疆九边重镇之一“榆林镇”驻地,又以其为延安、绥德之保障,故合两地之名,称为“延绥镇”。

明朝建立后,蒙古虽退入漠北,但仍频繁侵扰明朝北部边疆,榆林地区成为双方争战最为激烈的地区之一,为抵御蒙古侵扰,明朝在榆林地区设置了大量军事卫所,增强其军事防御能力。洪武二年(1369),明军攻占延安路,建立行政机构延安府,榆林地区属其所辖。洪武四年(1371),“大将军汤和置绥德卫,州军籍始此。”<sup>[1]</sup>榆林其地“分拨绥德卫千户刘宠屯治”<sup>[2]</sup>,以此标志榆林作为军户屯田的聚落点而开始纳入卫所管辖体系,称“榆林庄”。永乐初,“守臣奏筑营寨,集军望守”,<sup>[2]</sup>于是改“榆林庄”为“榆林寨”。正统年间,瓦剌强盛,不断侵犯明边,对榆林地区的侵扰也时有发生,明廷因考虑“延绥地方旷远,都指挥王永所领兵少”,为加强榆林地区的军事防御,遂将“榆林寨”改为“榆林堡”,增兵卫戍。“正统中,北虏屡入河套为患,特赦都督王祜镇守延绥等处,始建议筑榆林城及沿边砦、堡、墩台控

制之,遂为重地”。<sup>[3]</sup>王祜赴任时其职位为镇守,说明此时榆林地区已成为镇级军事防区。成化时期,漠南蒙古各部屡犯榆林地区,为强化防御,成化七年(1471),都御史王锐建制榆林卫。<sup>[4]</sup>成化八年(1472),余子俊为副都御史巡抚延绥,于榆林旧城北增筑城垣,置榆林卫指挥使司,隶陕西都司。并大举兴筑东西路边墙,达一千七百余里,更增建墩、台、堡、寨,大大增强了榆林地区的军事防御能力。同时,鉴于延绥镇旧治绥德卫地理位置较南,而外弃米脂、鱼河等处近二百里,蒙古轻骑入寇剽掠,镇兵出御,往往追之不及,常令蒙古骑兵有隙可乘。于是在成化九年(1473),将延绥镇镇治由绥德卫北徙榆林卫,至此,榆林正式成为延绥镇驻地所在。此后,经历年不断经营,筑设营堡,沿边营堡增至36座,分东中西三路分布守御,延绥镇军事卫所体系趋于完善,其辖区,“东抵偏关,西接宁夏,绵亘千八百里。”<sup>[5]</sup>屹然为一重镇。

为维持延绥镇的军事防御能力,明朝向榆林地区进行了多次军事性的移民实边活动,移民的主体以普通士兵及其家眷为主,其原籍涉及全国诸多省

收稿日期:2021-06-28

作者简介:乔壮(1995—),男,陕西榆林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地方史、民族史。

份,尤以山西、河南居多。民国《横山县志》称:“横山地处塞上,明属边卫,土著居民多由晋、豫军籍防屯而来。”《延绥揽胜》也载:“按《明会典》,延绥居天下九边之一,地方蒙套防御要冲……故其地土著居民皆自晋、豫、鲁、燕各地防屯抽调而来,今之沿边各县田赋百户诸名,均系当年统兵军官人员。”而其来源依据《延绥镇志》等资料记载整理,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归附:明代榆林为长城沿线重要军镇,也是蒙古与中原王朝往来的重要通道。元朝灭亡后,一些旧元贵族即经过榆林地区归附明朝,而明朝往往是将这些降众就地安置,授予卫所官职等。如洪武三年(1371)七月,“故元参政脱火赤等自忙忽滩来归,诏赐冠服,置忙忽军民千户所,隶绥德卫,以脱火赤为副千户,仍赐袈衣靴袜银诸物及其从人衣服有差”。<sup>[6]</sup>

2. 从征:明初随军西征至此者。清《续绥德州志》称:“溯前明洪武以来中山侯汤和、颍川侯傅友德防御延绥,所部士卒非旧日伍旅即新迁难民,肆立绥德卫各隶各屯,自是外来居民皆成绥德土著矣”。

3. 老军:明初调入绥德等卫的军丁,如榆林崔氏家谱记载,“其先颖上人,明太祖时伊始祖程以义勇从军,授榆林百户,世袭遂家于此”。即为此类。另外有一种“赖”字号军,“盖天顺初陕西参将李源清出各卫远年无勾之军、同名同姓而相推不承者,乃悉发榆林卫编伍”。<sup>[9]</sup>也属于此类。

4. 杂抽军:成化八年(1472),乱加思兰大举入侵河套地区,吏部侍郎叶盛、会总督王越、总兵许宁有虑于榆林防戍力量薄弱,奏请增兵,提议“清解六年、七年各省军之不服水土者,暂留实边,与清勾云南、两广、福建、浙江卫所军人,俱解榆林各卫以实边备。巡抚余子俊亦有是议。召、可之,谓之杂抽军。”<sup>[6]</sup>万历以后,杂抽军的征调仅限于陕西境内各卫所、州县。

5. 免粮抽丁:成化二年(1466),延绥守臣卢祥等鉴于营、堡兵少,“而延安、庆阳府州、县边民多肖勇耐寒,敢于战斗,若选作土兵,必能奋力。兵部奏请,敕御史往,会官点选。……于时,得壮丁五千余名”。<sup>[6]</sup>称为免粮土兵。嘉靖三十年(1551),从免粮土兵中抽丁,原为夏秋赴各边堡备边,遇冬返回,后改为常备驻军。

6. 滴发:明代榆林地处边疆,故常作为战俘、罪臣、刑徒等发配流徙之地,《延绥揽胜》载:“并清厘陕人,有伍籍罪滴者,悉数徙往榆林”。这些人抵榆以后也多安插于沿边各卫所,如万历三十九年六月,“乙卯,南直隶柘林营信地,获日本夷人三名,因航海过暹罗,飓风覆舟飘至,抚按以闻,部议分解陕西延绥等处戍边安插,从之”。<sup>[7]</sup>

经由上述途径迁入榆林地区的卫所移民数量又是多少呢?表1是根据不同资料中记载的明代不同时期延绥镇驻军数目整理而成,由表1可知延绥镇从成化六年(1470)至隆庆三年(1569)这100年间卫所驻军数目的变化情况:

表1 明代不同时期延绥镇驻军数目

年代	驻军数目(名)	资料来源
成化六年(1470)	5000	《明史》卷91边防
成化七年(1471)	20000	《抄本筹边纂议》
嘉靖八年(1529)	49250	《修攘通考》卷6
嘉靖十年(1531)	41451	《明经世文编》卷199
嘉靖二十年(1541)	15762	《全陕政要》卷1
嘉靖二十一年(1542)	30120	《皇明九边考》卷7
嘉靖二十六年(1547)	14029	《边政考》卷2
嘉靖二十八年(1549)	44036	《明经世文编》卷199
嘉靖三十六年(1557)	49250	《皇舆考》卷9
隆庆二年(1568)	49200	《皇明泳化类编》卷117
隆庆三年(1569)	50621	《九边图说》

如表1所示,从成化六年(1470)至隆庆三年(1569)这100年间延绥镇驻军数目虽然个别时期呈现缩减,但整体还是不断增加的趋势,隆庆三年(1569)驻军数目是成化六年(1471)榆林建卫前的10倍之多,榆林本地土地贫瘠,人口凋敝,如此之多的驻军力量必不可能全部取于榆林本地,所以,明代榆林地区存在大规模的军事性移民是完全可以确定的。同时明代军制规定,军籍由父子相继,世代为兵,普通士兵签发驻地,其家属亦被要求随往,即《明史·兵志》所规定的:“军士应起解者皆釜妻”,由是在各卫所驻地附近形成一定的军户聚落。若以一军户三口人计,隆庆时期榆林地区卫所移民应不少于十五万,这些军户构成了明代榆林地区人口的主体。乾隆《绥德直隶州志》记载绥德卫军户:“自父母、昆弟、妻妾、子女、以至婢仆下隶,大户之内,食口浩繁。小户之内,亦不似民户单薄,故按籍则户少而口多。”<sup>[8]</sup>据其关于万历年间绥德户籍记载:民一千一百一十二户,一万四千二百七十口;屯五千三百八十户,四万三千五百三十口。<sup>[9]</sup>军户与民户比例竟达5:1,隶属于军籍者达本地区人口的75%以上,足见军户人口数量之多。虽然明中后期卫所制度遭到破坏,各卫所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士兵逃亡,但军户人口仍应十分可观,据曹树基估计,至明代中后期,延绥镇主兵官军共36230名,若合家属则有近11万人。<sup>[9]</sup>

### 一、科教文举的兴起

明代之前,榆林地区长期是中原政权和少数民族政权反复鏖战的边疆之地,久经兵燹,加之土地贫瘠,交通闭塞,教育基础极其薄弱,原住民较少接受教育,“自秦汉迄元明,鼓鼙兵戈靡时或息,文教无修,殆未皇也”。即使是明朝建立之初,榆林地区还尚无实质的学校进行教学活动,“人习于战斗,唯知干戈,莫识俎豆。”<sup>[6]</sup>

“文化的播迁,固可由各种方式表现出来,如战争、交通、贸易、通婚、移民……使各种差异的人民接触后,发生文化上互相影响的作用。尤其是凡重要的文化远播,都与移民有关,这是一种显明的事实”。<sup>[10]</sup>明初大量来自内地文化昌盛之地的移民,他们迁入所形成的新的地域社会群体,不仅改变榆林地区原有的人口结构,也必然改变其落后的文化现状。

明朝建立之初,太祖朱元璋鉴于各地“学校之

教至元其弊极矣”<sup>[6]</sup>,以及出于招延人才,加强国家治理的需要,适时地推行“教化”政策,而“教化”政策的基础是学校教育,即所谓:“治国之要,教化为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sup>[6]</sup>但是,相较于内地,榆林地区等边地的学校教育基础非常薄弱,除了前述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长期战乱的影响等,时人保守的思想观念也是制约边地教育发展的重要因素,譬如洪武时期众议辽东建学,即有人认为:“边境不必建学”,嘉靖中期,陈秉巡抚甘镇时曾遣人购书于陕西,以资本地教学之用,却有人对此质疑:“河西用武之地,钱谷可多积者,甲兵可多积者,多积书何为也?”<sup>[12]</sup>但所幸统治者还是从长远眼光出发,对边地推行文化教育保持了较为清醒的认识,如明太祖针对前引有人提出的“边境不必建学”的说法,以箕子和管宁教化边民的事迹为例言明边地之民亦可通过教化而学有所成。有了统治者的支持,赴任榆林地区的卫所长官也多致力于学校的建立,纷纷以“振兴文风为己任”,常“留意学校”,“葺治学宫”,以榆林为中心的北六县儒学皆建立于此。

除了广设学校,卫所长官还注重延聘名师确保学校教育的质量。成化十四年(1478),榆林卫儒学建立以后,巡抚余大容即聘请皖籍名师纪温任教。纪温,祖籍安徽蒙城,曾任吏部司务,太仆寺少卿,后致仕归里。成化年间,聘为新设的榆林卫学馆教习,徙居榆林,在职期间,使榆地“民气安静,勤农务、崇节俭、习齐射、尚忠勇,士敦学业,文风渐兴”。另外,卫所长官对于部分品学兼优、家境贫寒的学生,还给予特别的优恤,助其完成学业。如榆林卫学廪生,旧无廪膳。嘉靖八年,巡抚萧准规定:每生遇考优等者,月给米三斗,菜银五分,称为正优。

正是这些卫所移民对于教育的热忱以及任职官吏的普遍重视,为榆林地区的教育事业积淀了宝贵的基础,致使明代以后榆林地区各州县“文风丕振”,“科不乏人”。据道光《榆林府志》,明清两代榆林共产生进士84人(文34人,武50人),举人491人(文144人,武347人)。<sup>[11]</sup>其中仅创立于明弘治八年(1495)的“榆阳书院”,明清两代就培养进士38人(文10人,武28人);举人285人(文40人,武245人);贡生43人。嘉靖中期,巡按御史杨博在《请改救巡按御史兼理学政疏》中说道:“我国家自混一以来,绝徼穷荒,莫不有学,其在陕西,如延绥,如宁夏,则文望蔚然,科举相望。本镇(甘肃镇)百八十

年来,科甲不过一二人,乡科亦仅数人。方之二镇,天渊悬绝。”<sup>[12]</sup>对榆林地区教育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高度的评价。

## 二、忠勇贞烈地域精神的形成

地域精神指的是为一特定地域内民众所认同、遵守的带有地域特色的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和道德理想的总和,即道德精神。钱穆先生认为道德精神,“其惟一最要特征,可谓是自求其人一己内心之所安”。<sup>[13]</sup>钱穆先生所谓“自求其人一己内心之所安”,其实是追求一种至高的“善”的精神理想,在实践过程中则表现为高度的道德自觉和合目的性。钱穆先生亦将之概括为一种“善我生”和“善我死”的精神。<sup>[13]</sup>这种精神后来多具化为忠义、贞烈、孝道等,成为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内容。明代榆林地区的卫所移民,主体以军人为主,长期为国戍边,与敌作战,以忠君报国、恪尽职守为己务;以忠孝两全,舍生取义为追求,所以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这一地区产生了无数可歌可泣、为国捐躯的英烈人物,其事迹也长期在榆林地区广大人民中口耳相传,形成以忠勇贞烈为鲜明特征的地域精神。

万历《延绥镇志》记载榆林卫的风俗时即称:“人尚勇武,以斩馘为生计,士敦节义”。<sup>[14]</sup>“榆林地险,将士怀忠畏法,死无怨言。又果悍敢勇战,不贯胄。寇呼为“骆驼城”,人马见则畏之。四方征调,所向有功。更多将材,有节气,视他镇为最”。<sup>[15]</sup>据万历《延绥镇志》和道光《榆林府志》统计,明清两代,榆林地区为国殉身的英烈近900人,为陕西诸州县中所罕见,可谓“忠义闻于大众,烈节著于三秦”。殉身的英烈中不乏职务较高者,任过总兵职务者达16人,但更多的是普通官员和士卒。这些英烈,总兵者不以己之总兵身份而惮战,国难之前,敢于身先士卒,宁死不屈;士吏者不以身份低微而退却,生死关头,敢于挺身而出,英勇就义。他们都不惜以殒身殉国来昭示自己对于国家、社稷的忠节,谱写出一幕幕惊天动地的英雄悲歌。与此同时,另一特殊群体——上述军烈的遗孀,也以不同的方式,或殒身殉夫,一决已矣;或忍死完节,尽孝抚孤,践行其对于爱情的忠贞和道义的恪守。

据万历《延绥镇志》记载,榆林地区明代“烈女”数量为97人,是明代之前烈女总量(宋1人,元1人)<sup>[16]</sup>的48.5倍。何以明代榆林会出现数量如此之多的烈女?这一方面是特殊的地理格局所孕育出

的民之秉性使然,“地方千里,山高水激,风劲气寒,人性永健,悃信义,故多贞烈之节”。但另一方面,也与明代榆林地区大规模卫所移民所形成的以军人为主体的社会环境关系密切,而这恰恰是内地社会所不具备的特质。明代以后,地处河套南缘的榆林地区成为明朝和蒙古反复争战的焦点地区,旷日持久的战争使阵亡士兵数量大幅增长,与之相应的是烈属妇女数量的增多,这些妇女们在丧夫时所表现出的高度自觉的一致抉择,除了部分是因为其自身个性品格和所接受的伦理道德教育所致,更多的则是与其特殊的军属身份背景有关。据万历《延绥镇志》,明代延绥镇烈女数量共计97人,其中军属为72人,军属比例达四分之三,受传统伦理文化影响,明代社会一般女性将“背夫不义”、“从一而终”视为婚后的理想信念,这种信念在实践层面则表现为对丈夫的忠贞、死节或殉夫,总体而言,军属出身的女性相较于普通女性,对这一信念的奉行更为坚定,在实践层面上更加重死轻生,丈夫为国殉职后,政府往往会为之旌奖,致使她们注重维护已故丈夫的名节,而自己的生命常置之度外。在这一普遍的伦理文化背景之下,加之本地区特殊的地理人文环境,使此类贞烈事件深深地印上地域的烙印。

## 三、关帝信仰的兴盛

明代榆林地区的关帝信仰是随卫所移民的迁入而逐渐兴起的。因关羽被尊为“武圣”,是“英勇神武”的象征,又因其“忠、义、信、智、仁、勇”的人格品质,所以军队之中对关公敬畏有加,并随戍边将士的入驻而将其推行于驻地附近,榆林地区的关帝庙大多即建于此时。不仅州、县城内关帝庙数量繁多,延绥镇所辖诸城堡、甚至偏僻乡野也不乏关帝庙的存在。

明代榆林地区战事频繁,戍边将士出征之前,通常会去武庙对关帝进行祭祀祷告,以祈求战事胜利,平安凯旋,或者沙场建功,封妻荫子。万历《延绥镇志》就曾记载:“成化末,虏大举寇清水,太監韦敬会总兵许宁、副总兵李坞往剿之。过庙,宁祝曰:王能助宁一战,回即新庙彰灵。兵至木瓜园,许与韦偶都兵,遂不复有行伍横奔。赴清水,贼望尘奔逃,视清水营雀儿沟如平地,人马俱落,沟为平,遂大捷。凡斩虏首五百余级,填沟之虏无算,不计功。后降者回报曰,贼见我兵皆长髯红面、大刀赤马,始知为王助阵。”<sup>[17]</sup>从中可知关帝信仰在军事战

争中具有凝聚军心、激励作战的重要作用。

时至今日,榆林地区关帝的信仰主体早已不是最初的卫所军人,而演化为这一地域内的广大普通民众,同时,“关帝”的称呼和职能发生了转变,首先是其称呼的转变,榆林民间多俗称其为“老爷”,老爷一词包含有“权威、尊崇、神圣”的意思,相应的“关帝庙”也多称为“老爷庙”,而每年对关帝进行酬神的庙会,也称为“老爷会”。

其次是其职能的转变,关羽最初是作为“武圣”、“战神”而崇拜的,其职能主要表现为对军事的护佑。但明代中期以后,榆林地区战事逐渐减少,而关帝信仰的信众日益广泛,单一的军事职能显然不能满足扩大以后普通信众的信仰需求,因而普通信众将关帝信仰与自身干旱少雨的居住地域相联系,使其具有和“龙王”类似的司雨职能,譬如榆林地区的“老爷会”常以农历五月十三日作为会期,这天也称为“关老爷磨刀日”,民间认为五月十三是雨节,因为五月十三多降雷雨,相传这雷声便是关老爷的磨刀声,而这雨水则是关老爷的磨刀水。

除了司雨职能,榆林地区的关帝还衍生出商业保护神的职能,明朝曾于榆林沿边设立易马城、款贡城等多个与蒙古贸易的边市,商人谓“以义生利”,战乱的环境中,关老爷具备的忠义品格为汉蒙民族所共同认可,因而双方贸易时将其作为行业保护神。今榆林红石峡三义庙即为清代汉蒙边商集资共建,每年汉蒙集市贸易皆在三义庙前进行。另外,《绥远通志稿》记载近代蒙地关帝信仰时称:“关帝与吕祖各庙亦遂成为绥远沙门长住之地……因关庙之多,几成绥境沙门最重要之住持地”。<sup>[14]</sup>可见,源于汉族的关帝信仰随汉蒙民族间交往的不断深入,为广大蒙古族同胞所接受,已成为蒙古族除喇嘛教以外的重要信仰。

#### 结语

明代榆林地区的卫所移民,是明代大规模移民浪潮的一个缩影,但它又不同于“洪洞大槐树”为标志的民籍移民运动,而是因卫所建制而引起的军事性质的移民运动,具有特殊性,有助于我们认识明代移民的来源与性质的多样性。同时,数量众多的卫所移民群体对陕北地区边地社会的政治、经济、

文化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我们研究陕北地域文化的重要视角。以榆林地区为中心,明王朝通过不断地征调卫所移民,屯垦戍守,不仅巩固了陕北地区的边防,也促进了边疆民族间的互动联系,通过友好接触和交往,增进了双方的理解和信任,少数民族深受汉文化的熏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观念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不断深入人心。榆林地区的案例表明,基于地域文化视角的研究,对于我们探究特定时期、特定地域的族群特色、风俗信仰、人口结构、区域演变、民族交往等社会文化现象,具有重要的价值。

#### 参考文献:

- [1] 高文岳纂.绥德州志[M].孔繁扑修,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69.
- [2] 榆林市志编纂委员.榆林市志[M].西安:三秦出版社,1996.
- [3] 郑汝璧.延绥镇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4] 张廷玉.明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4.
- [5] 谭吉璠,等.延绥镇志[M].刘汉腾,纪玉莲校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6.
- [6] 杨士奇.明太祖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7] 叶向高.明神宗实录[M].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2.
- [8] 吴忠诰,等.绥德直隶州志[M].乾隆四十九年刻本.
- [9]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 [10] 杨成志.文化播迁的差别方式[M].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4.
- [11] 李熙龄.榆林府志[M].陕西省榆林市地方志办公室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 [12] 钟庚起.甘州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有限公司,1976.
- [13] 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4.
- [14] 绥远通志馆.绥远通志稿[M].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孙付杰]